

上海图书馆藏《语石》稿本考述

姚文昌

内容摘要:上海图书馆藏有《语石》稿本一部,系作者手稿誊清,后来又经叶昌炽本人批改,张炳翔校阅。《语石》稿本的文本层次分明,内容丰富,保留了《语石》撰写、校改、刊刻等多个阶段的痕迹。本文以此《语石》稿本为中心,结合《语石初稿》《缘督庐日记》等相关材料,全面考察《语石》从撰写到刊刻的整个成书过程,进而揭示这部稿本对于《语石》文本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。

关键词:《语石》 稿本 成书 学术价值

《语石》一书,由晚清著名学者叶昌炽撰写,宣统元年(1909)刊行于世。作为我国第一部通论性的石刻学著作,《语石》集古代石刻学之大成,开近代石刻学之先河。该书问世后,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借鉴了《语石》的体例,顾燮光《梦碧簪石言》乃是《语石》的效仿之作,柯昌泗《语石异同评》意在《语石》内容进行研究补充,韩锐《语石校注》侧重于对《语石》内容的阐释,毛远明《碑刻文献学通论》继承了《语石》的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,等等。然而,这些著作都是立足于《语石》的定本,《语石》本身的成书过程则很少有人关注。

上海图书馆藏有《语石》稿本一部,共七册,包括正文六册、《叙目》一册。其内容大致分为三个层次:1.清稿本。绿格,四周双边,白口,单鱼尾,版心写卷次、页数,版心下刻“五百经幢馆”五字。半页十行,行二十四字。2.叶昌炽的手批。有眉批、旁批、签批等。3.张炳翔的校语。有眉批、签批二种,文末多钤“炳翔”白文方印,亦有一处钤白文方印“忍庵”。下面依次从《语石》稿本的文本层次、装订、学术价值等方面进行考述。

一、《语石》稿本的形成

《语石》稿本的成书大致经历了撰写、补撰、校改、誊写四个阶段。

(一)撰写阶段:庚子年(1900)三月至辛丑年(1901)十一月初。

《缘督庐日记》“辛丑年十一月初五日”载:“余自去年三月发愤作《语石》一书……长夏国难作,遂辍笔。自昌平避地归,键户无聊,日作一二通,以销悍况。荏苒年余,至今日始卒業。”^①关于《语石》具体撰写过程,《日记》没有记载。上海图书馆另藏有《语石初稿》(以下简称“《初稿》”)一部,可以补充《语石》撰写的若干细节。

《初稿》封面题“语石初稿”四字,后题“叶昌炽手稿”五字。扉页题“碑已,覆瓿”。全书为单页纸手写,贴于宣统元年四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评选《中学国文读本》第二册《国朝文》背页,从封面页起,有文字者共计四十五页。全书字迹潦草,涂抹钩乙,信手而就,多有文字不易辨识之处。经与刻本《语石》比对,《初稿》实际上只是叶昌炽《语石》卷八的部分手稿,共计三十一则,对应刻本的顺序依次是:

1.唐宋宸翰五则之一、三(后题“八月初三日灯下又作二通”)。2.唐宋宸翰五则之四(后题“初四”)。3.名臣二则之一、二(此二则《初稿》原为三则,后题“初十日三则”)。4.名儒一则,诗人一则(后题“十一日二通”)。5.武人一则,奸臣三则之一(后题“十二日作二通”)。6.奸臣三则之二、三,奄人二则之一,妇人一则(后题“十三日作四通”)。7.缙流二则之一、二,羽冠一则,仙迹一则,外国人书一则(后题“中秋日作五通”)。8.乡先哲书二则之一,集王一则,集诸家书一则,集欧集褚集颜集柳一则(后题“十六日作四通”)。9.各人分书二则之一、二,一碑两人书一则,各体书二则之一,唐梵二则之一、二(唐梵二则,《初稿》原为一则,后题“十七日作五通”)。10.唐宋宸翰五则之二、五(后题“补宸翰之末,十一月初十”)。11.乡先哲书二则之二(后题“补乡先哲书一条之后,辛丑十一月初九在史馆作”)。^②

三十一则之后又有两段文字,见于初刻本“奸臣三则之一”,其末题“补‘金轮’之上,冬至”。除去最后的三则又两段文字之外,其他的条目均写于辛丑年(1901)八月初三日至十七日。

根据《初稿》扉页的“碑已”字样可以推测,叶昌炽《初稿》的成册当是以天干排列的,此本之前的《初稿》应该有五册,根据内容篇幅估计,后面也应该有一至二册,可惜的是《初稿》仅此一册流传至今。《语石》一书的撰写在接近两

^①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2年,第3521-3522页。

^②叶昌炽:《语石初稿》,稿本,上海图书馆藏,索书号为线普长442069。

年的时间里无疑是叶昌炽最为主要的学术活动,而关于整个撰写过程的信息却不见于《缘督庐日记》,《初稿》一册因此显得弥足珍贵。

(二)补撰阶段:辛丑年(1901)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底。

《语石》撰写完成后,叶氏并没有将成稿搁置一旁,而是紧接着对其进行了补撰,补撰用时近两个月,具体过程见于《缘督庐日记》:

(十一月)初七日:“编定《语石叙目》,共十卷,四百三十七则。内指一挥一则须检府谷江阴拓本补撰。”初八日:“灯下作《语石自序》一首。又补论南北朝书人一通。”初九日:“史馆堂期,午前即往……独坐无聊,补《语石》二通,即书于牍背,携以归。”初十日:“补《语石》二通。”十一日:“灯下补《语石》一通。”十三日:“灯下补《语石》一通。”十四日:“灯下补《语石》一通。”十五日:“又《碑版广例》,是新印本,有烂板,可补《语石》之未备。灯下疾读一过,采数则,始知此书与《语石》涂径相通,但彼所重者在文字义法、题署格式,而拙稿意在访求,在收藏,在鉴别,仍是同床各梦耳。”十七日:“以《碑版广例》补《语石》四通。”廿四日:“灯下补《语石》二通。”廿八日:“灯下补《语石》三通。”(十二月)初六日:“灯下补《语石》二通。”初八日:“灯下补《语石》二通。”二十日:“灯下补《语石》二通,删一通。”廿二日:“灯下补《语石》二通。”廿四日:“补《语石》三通。自脱稿后,以《金石萃编》、《续编》、《绩语堂碑录》拾遗补阙,至今日甫毕。”^①

《初稿》最后所载三则又两段文字为十一月补撰,其中“唐宋宸翰五则之五”后题“补宸翰之末,十一月初十”,可与《日记》所载十一月初十“补《语石》二通”相照应,“乡先哲书二则之二”后题“补乡先哲书一条之后,辛丑十一月初九在史馆作”也可与《日记》所载“史馆堂期,午前即往……独坐无聊,补《语石》二通,即书于牍背,携以归”相照应。两段文字后题“冬至”,辛丑年冬至为十一月十二,正可补《日记》之阙。

(三)校改阶段:癸卯年(1903)六月初八日至七月初十日。

在补撰完成一年半之后,叶氏开始对《语石》进行校改,校改的同时亦偶有补撰,校补时重点吸收了叶氏任甘肃学政后的见闻。

(六月)初八日:“校《语石》一卷。”初九日:“校《语石》第二卷。甘肃一则订正踳驳。又补纂两则,以近所见石刻埤益之。”初十日:“校《语石》第二卷毕。”十二日:“补撰《语石》一则。”十五日:“校《语石》第三卷毕。”十六日:“校《语石》,重改定造像二则。”十八日:“校《语石》第四卷毕,陇上新见诸刻颇有增加。”(七月)初一日:“校《语石》竟第六卷。”初二日:“校《语石》第七卷毕。”初六日:“校《语石》第八卷毕。”初九日:“校

^①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》,第3523-3558页。

《语石》第九卷毕。”初十日：“校《语石》第十卷毕。原分卷次第多寡不匀，分第三卷为二，并六、七两卷为一，暂作定本。此间无好刻手，尘封篋衍，以俟异时之覆瓿耳。”^①

(四)誊写阶段：癸卯年(1903)六月初至七月上旬。

《日记》“癸卯年六月初九日”载：“校《语石》第二卷。甘肃一则订正踳驳。又补纂两则，以近所见石刻埤益之。”^②稿本卷二载“甘肃三则”，其二云“度陇一年，周历通省”，其三云“暨校士至肃州”，可知此二则即是《日记》所云“补纂两则”。稿本卷二的誊写在此之后。稿本《叙目》载“甘肃一则”，可以推测《叙目》的誊写早于正文誊写。

稿本《叙目》之后有叶昌炽手书识语：“此书脱稿后，阅两月，即奉视学甘肃之命度陇，见闻略有增益。缮写既竟，行篋无书，订正阙疑，俟诸异日。癸卯初秋，缘袈又记。”《日记》“癸卯年七月十二日”载：“《语石》装订成四册，《叙目》一册，灯下翻检，乌焉亥豕，尚未廓清，非重校不可，亦非手校不可。”^③可知稿本的誊写在此时已经完成，并且装订成册。

稿本的誊写时间是癸卯年六月初至七月上旬，装订成册时间是七月十二日，而校改阶段的具体时间是六月初八日至七月初十日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稿本的誊写与这个阶段的校改几乎是同时进行的，叶昌炽每校完一卷，随即由抄手进行誊写，最后一卷七月十日校改完成，十二日时就完成了誊写。

二、叶昌炽的手批

由于稿本《叙目》的誊写是最先完成的，故其所反映的是《语石》癸卯年(1903)六月校改开始之前的面貌。

首先，叶昌炽是将《叙目》对照稿本进行修订，使二者统一。《叙目》“北朝三则”，“三”改为“四”；“吴越二则”，“二”改为“一”；“甘肃一则”，“一”改为“三”；“碑文袭旧一则”，“一”改为“二”。这些条目的修订均是依据稿本的正文。《叙目》另有大量条目的修订，其根据则是叶氏后来的批改。

其次，批改将稿本《叙目》卷三从“界至四则”与“诗文一则”之间一分为二，以后半部分为卷四，并改原卷四为卷五，原卷五为卷六，原卷六、卷七合为卷七，正文的每卷卷首及每页版心均进行了相应的修改。《日记》“癸卯年七月初十日”载：“校《语石》第十卷毕。原分卷次第多寡不匀，分第三卷为二，并六、七两卷为一，暂作定本。此间无好刻手，尘封篋衍，以俟异时之覆瓿耳。”^④可见叶氏在校改阶段完成的同时，即对稿本《叙目》进行了批改。随着“十二日”稿本誊写完毕并装订成册，《语石》的校改暂时告一段落。

①叶昌炽：《缘督庐日记》，第4184-4201页。

②③④叶昌炽：《缘督庐日记》，第4184、4205、4201页。

此后,《语石》刊刻之前的数年时间里,叶氏陆陆续续对《语石》进行修订,这些修订均以叶氏手批的形式反映在《语石》稿本之上。

就叶昌炽的手批来看,在条目的增删上,改动如下:“西夏一则”增为“西夏二则”;增“吐蕃一则”;增“贵州一则”;“埃及一则”增一则改为“欧非两洲二则”;“碑侧四则”第一则划入“碑阴四则”,成为“碑阴五则”、“碑侧三则”;“符牒三则”增为“符牒四则”;“买地菑一则”增为“买地菑二则”;删“草稿一则”,“碑文袭旧一则”增为“碑文袭旧二则”;增“碑版有资风教一则”;“撰人题款四则”析为“总论撰书题款二则”、“撰人题款二则”;增“选石一则”;“蔡京蔡卞一则”增为“蔡京蔡卞二则”;“名臣三则”合为“名臣二则”;“各体书一则”增为“各体书二则”;“隋唐以下金文一则”增为“隋唐以下金文二则”。

叶氏集中对《语石》进行批改是在1906年离任甘肃学政返回苏州之后进行的。正如初刻本《叙目》后“自记”云:“此书脱稿后,越二月,即奉视学甘肃之命度陇,见闻略有增益。丙午归里,养痾涑川,再加厘订,去其复重,距辛丑写定又八年矣。”

需要指出的是,叶氏对《语石》的集中批改并非始于“丙午”年(1906)。《缘督庐日记》“丙午年六月十三日”载:“己刻,抵苏州葑门。”①“七月廿七日”载:“又答谢郎亭师,长谈,索观《语石》稿,允之。”②“八月一日”载:“寄郎亭师一缄,以《语石》四册、《叙目》一卷就正。”③“八月十九日”载:“吉詹,此日移家涑川。”④可见,在叶氏移居涑川之前,《语石》稿已经寄给了“郎亭师”⑤。那么,《语石》稿又是何时重归叶氏呢?《缘督庐日记》“丁未年三月初八日”载:“伯南以学堂中文有金石之学,屡次虚衷下问。拙著《语石》稿,可备刍蕘之采。惟原稿在郎亭师处久未归,因作伯南一缄、郎师一缄。又以一函告星台转达,即属伯南持函往领。”⑥“五月初六日”载:“三妹亦派其奴阿桂随同照料,带至伯南一函、《语石》五册。”⑦可知,《语石》稿在汪鸣銓处时,又为“伯南”借去⑧,至“丁未年(1907)三月初八日”才重归叶氏。叶氏对《语石》稿的集中批改不会早于这个时间。

由于批改的前后时间跨度较大,叶氏在此期间亦遭受了诸多变故,《日记》中关于这段时间内《语石》批改的记载十分有限:

①②③④⑦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》,第5323、5361、5364、5376、5578页。

⑤汪鸣銓,字柳门,号郎亭,同治四年进士。叶氏师事之。

⑥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》,第5539-5540页。

⑧孙宗弼,字伯南,号式甫。2007年嘉德秋拍有《语石》十册,“图录”中编号1688,著录为“清光绪间叶氏手稿本”。其中一册前有章钰题记:“《语石》一册,叶缘督未刻书,从孙伯南许借读。宣统纪元正月,茗理题记。”可知,该册曾为章钰从孙宗弼处借读,则该册《语石》很可能是孙宗弼借阅《语石》稿时誊录的副本,而非“叶氏手稿本”。

(癸卯年七月)廿八日:“覆校《语石》一通。”(四月)二十日:“前仲午寄示蔡元长《赵瞻碑》、元度《熊本碑》各一通,文勤师旧藏也,皆有师手跋。《赵碑》余亦有两通,惟《熊碑》孙、赵两家均未著录,虽以艺风收藏之富,亦未见,可知其难得矣。今日出以摩挲,试临六十餘字,并据以补《语石》一则。”(五月)廿八日:“据郑子尹《卢丰碑石歌》,补《语石》贵州一则。”廿九日:“灯下改正《语石》一则。”(六月)初四日:“又卷九一则增改为二则,补撰卷六一则。”^①

以上记载能与叶氏批改明显对应的仅有戊申年(1908)四月二十日、五月廿八日、廿九日三条,其中四月二十日所补当是“蔡京蔡卞”一则,五月廿九日所补当是“各体书”一则。

叶氏的批改还包括各条之内誊写的讹误、语言的修饰、内容的完善等方面。可以说,经过这个阶段的批改,《语石》稿本的内容已经和刻本《语石》相差无几。

三、张炳翔的校语

张炳翔,字叔鹏,江苏长洲人。初刻本《叙目》后“自记”载:“订疑勘误、相助为理者,上海秦介侯大令、青浦张亦钱中翰及同里张叔鹏孝廉也。”张炳翔受业于叶昌炽,为其校勘《语石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

关于《语石》刊刻过程中的校勘工作,《日记》中有详细的记载。《语石》的每一个版面都经过了校写样、校红样两个过程,而张炳翔所参与的是校红样,上海图书馆即藏有张炳翔当时校勘所用红印本,卷二末有张氏自题“受业长洲张炳翔校字”^②。

《语石》稿本有两处关于校勘时间的记载。卷一首页下有张炳翔手书:“戊申十一月二十三日受业张炳翔校阅。”下钐“叔鹏手校”白文方印。卷三前题:“长至前一日灯下受业张炳翔校阅一过。”下钐“叔鹏手校”白文方印。“长至”指长至节,即冬至,戊申年(1908)冬至为十一月二十九日,则张炳翔校阅完成《语石》卷三的时间为十一月廿八日。《日记》中对张炳翔校阅《语石》红印本之事亦有记载:

(戊申年十一月)廿六日:“又附去叔朋一函,《语石》原稿四册,新刊红样五册,自卷三以下请其先校,再由鄙人覆勘。又以已校出之首二卷付稚圃改修,卷二有舛板五叶,经叔朋看出,重刻或非所愿,可警其下次,多一人过目,为不虚矣。”(十二月)初一日:“附到叔朋一缄,并校出《语石》卷三样本及原稿一册。”初八日:“得仲午、叔朋两函,《语石》第十

①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》,第4215-5877页。

②郭立暄:《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》,中西书局,2015年,第416页。

刻样、原稿各一卷，眉端签识如麻，皆叔朋笔也。其所见所藏，至纤至悉，随条增窜，然则此书为清河一家而作，是亦书画舫矣。”十五日：“得仲午书，寄到叔朋新校出八、九两卷，原稿四卷。一、二、八、九。”^①

张炳翔校阅《语石》从十一月下旬开始，廿三日完成卷一，廿六日已完成卷二，廿八日完成卷三，十二月初八日已完成卷十，十五日已完成卷八、卷九。

四、《语石》稿本的装订

《日记》“癸卯年七月十二日”载：“《语石》装订成四册，《叙目》一册，灯下翻检，乌焉亥豕，尚未廓清，非重校不可，亦非手校不可。”^②翻检清稿本各卷，卷一前题“卷壹之卷叁”，卷四前题“卷肆之卷伍”，卷六前题“卷陆之卷柒”，卷八前题“卷捌之卷拾”。原始的分册应该即是如此，自题字起各为一册，共四册，四处题字当是装订时所写，另有《叙目》一册。

上海图书馆所藏《语石》稿本现为七册，《叙目》为一册，正文为六册，则是后来经过重新装订。具体分册：第一册为卷一、卷二，第二册为卷三，第三册为卷四、卷五，第四册为卷六、卷七，第五册为卷八、卷九，第六册为卷十。

《日记》“戊申年十月十二日”载：“校《语石叙目》毕，共十五叶。全书写样一律告竣。”^③“十五日”载：“寄仲午一函，《语石》原稿十卷，付稚圃重装。”^④由此可以推测，为了方便，写样时将《语石》稿本原来的装订拆开了，在写样完成后，随即进行了重新的装订。

（戊申年十二月）初八日：“得仲午、叔朋两函，《语石》第十刻样、原稿各一卷，眉端签识如麻，皆叔朋笔也。其所见所藏，至纤至悉，随条增窜，然则此书为清河一家而作，是亦书画舫矣。”^⑤十五日：“得仲午书，寄到叔朋新校出八、九两卷，原稿四卷。一、二、八、九。”^⑥可知正文原装订为四册时，卷一至卷三为一册，卷八至卷十为一册，而此时卷三、卷十已经单独成册，这与《语石》稿本现在的装订册数恰好吻合。

《语石》稿本卷三第十五页后有写样二页，左右双边，单鱼尾，版心写卷次、页数，每半页十一行，行二十三字。上有叶昌炽关于脱误及格式、避讳缺笔的批改。其版式、内容与《语石》初刻本卷三第十四页、第十五页一致，可知此二页为叶氏批改后由徐稚圃重新写样上版，而徐稚圃在重装《语石》稿本时不慎将废弃的两页写样一并装入。

五、《语石》稿本的学术价值

《语石》稿本的文本层次分明，内容丰富，保留了《语石》撰写、校改、刊刻

①叶昌炽：《缘督庐日记》，第6030-6041页。

②③④⑤⑥叶昌炽：《缘督庐日记》，第4205、5989、5990、6036、6041页。

等多个阶段的痕迹,以此《语石》稿本为中心,结合《语石初稿》《缘督庐日记》等相关材料,可以全面考察《语石》从撰写到刊刻的整个过程。不止于此,这部稿本对于《语石》本身的研究也有多方面的参考价值。

(一)解释初刻本《语石》正文与《叙目》以及《日记》所载则数的差异

《语石》初刻本“自序”载:“自庚子三月创稿,中更国变,麻鞋出走,未携行篋。迨昌平避地归,室如悬磬,残缣朽帛,狼藉满地,此稿从墙角检得之。銓與未返,豺虎塞途,键户无聊,厄言日出,至今年十月下旬始卒業,都四百八十六通,分为十卷,粗可写定。”后署“光绪二十七年岁在辛丑十一月长洲叶昌炽自序”。

《语石》初刻本目录与正文所载条目是一致的,经过统计,卷一61则,卷二66则,卷三47则,卷四38则,卷五52则,卷六40则,卷七63则,卷八52则,卷九28则,卷十37则,总计484则。这难免让人怀疑《语石》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十一月写定时为486则,经过数年的增删,最终付梓时定稿为484则。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

《日记》“辛丑年十一月初七日”载:“编定《语石叙目》,共十卷,四百三十七则。”^①《语石》清稿本“自序”作“四百 十 通”,叶昌炽手写补入“八”、“六”二字。检《语石》稿本,经叶氏批改后,其目次与初刻本几乎完全一致,唯初刻本卷九“碑厄二则”,《语石》稿本作“碑厄四则”,其条目总计486则。稿本“碑厄四则”之二、三、四则,在最后刊刻时合为一则。

综上,《语石》在辛丑年(1901)初步写定时为437则,至戊申年(1908)校改完成后为486则,直至最终刊刻时才改为了484则。初刻本《语石》所称的“四百八十六通”既不是“自序”所说“辛丑(1901)十一月”的则数,也不是己酉(1909)三月原刻定本的则数,而是戊申年(1908)《语石》接近付梓时的一个状态。

(二)为初刻本《语石》讹误的校改提供版本依据

例一:《语石》卷一第11页第10行至第11行:“‘年’、‘月’、‘日’亦写作‘𠂔’、‘𠂔’、‘𠂔’。”据本则《宣和书谱》所引及《张玄弼墓志》拓本,“月”作“𠂔”,“日”作“𠂔”,初刻本误倒,稿本不误。

例二:《语石》卷二第9页第6行至第7行:“亦间为黎邱所眩也。”“黎邱”当作“黎邱”,稿本不误。《吕氏春秋》卷二十二《疑似》篇载邑丈人惑于黎丘之鬼而杀子事。

例三:《语石》卷五第40页第17行:“又有陈搏书‘福寿’字。”“陈搏”当作“陈抟”,稿本不误。陈抟,字图南。蒋超《峨眉山志》卷二载:“大峨石在神水

^①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》,第3523页。

侧,有吕纯阳书‘大峩石’三字、陈图南书‘福寿’二字。”

例四:《语石》卷六第1页第10行:“书佐广丰郭香察书。”据都穆《金薤琳琅》卷六“汉西岳华山庙碑”条录文及严可均《全后汉文》卷一百“西岳华山庙碑”条录文,“广丰”当作“新丰”,稿本不误。

(三)表明了初刻本的异体字、俗体字不是随意为之,而是有所抉择

例一:《语石》卷一第10页第4行:“崔逸《郁林观东巖壁记》。”“巖”,清稿本原作“岩”,叶氏改作“巖”。

例二:《语石》卷五第3页第2行至第3行:“开皇四年《任洪乱合邑七十八人》。”“乱”,清稿本原作“亂”,叶氏改作“乱”。

例三:《语石》卷五第19页第17行至第18行:“定州都县翟城乡口藻村佛弟子刘绪施。”清稿本原作“望都”。张炳翔校语:“‘望都’当是‘望都’。从王。”叶氏批改:“此‘望’字依石本写,不必改。”

例四:《语石》卷六第8页第6行:“式刊贞筭。”“筭”,清稿本原作“筭”,叶氏改为“筭”。

(四)反映了《语石》一书的修改细节以及叶氏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

例一:《语石》卷一第25页第12行至第15行:“名臣如李伯纪、胡邦衡,理学如朱晦庵、张南轩,诗人如范致能、陆务观、杨诚斋,皆有遗迹,其书多跌宕可喜,与辽、金石刻不啻有雅郑之别,然皆不必以书名。”“不必”,清稿本原作“不能”,叶氏改作“不必”。一字之改而句意大变,前者为名臣、理学家、诗人而感到遗憾,后者则充满了对前贤的仰慕之情。

例二:《语石》卷二第13页第5行至第8行:“壬寅春,经才奉讳,昌炽被命承其乏。度陇四年,周历通省,使车所至,以金石学进诸生而策之,无能对者。”“度陇四年”,清稿本原作“度陇一年”。据前文,该条写于癸卯年六月初九日,叶氏写作“度陇一年”本不误,但叶氏在甘肃学政任上共四年,故刻本改为“度陇四年”,表达更为准确。

例三:《语石》卷八第19页第3行至第5行:“后至元五年有《贡副寺长生供记》,比丘邵元撰,正书。又《新燃玉佛殿记》,沙门邵元撰,书者智昇也。”“又新燃玉佛殿记沙门邵元撰书者智昇也”十七字,清稿本原作“所谓贡副者,当是其国朝贡副史立寺于此”,共十七字。叶氏加入新材料一则,本不必对原稿进行删减,无奈写样甚至刻板已经完成,只能退而求其次,删除原稿解释性的文字,然后将拟加入的材料以同样的字数进行表述,可谓用心良苦。

(五)揭示了张炳翔对《语石》一书的校勘贡献

例一:《语石》卷一第9页第12行:“至以《楔帖》殉昭陵。”“楔”,清稿本原作“楔”。张炳翔校语:“楔,从示。”

例二:《语石》卷二第6页第2行:“《封龙山颂》。”清稿本“封”原作“丰”,张

炳翔校语：“‘丰’似‘封’之误。”

例三：《语石》卷十第22页第3行：“毕秋帆在关中得四唐石，置之灵岩山馆。”张炳翔校语：“毕氏四石拓本绝少，即毕氏后人亦无藏本。余有《张希古》、《孙志廉》、《高延福》三志，均初拓本，乃得之花桥潘氏，毕君趾应曾借观，云伊家只藏有《张听志》一种。”张氏校语多有此类论及碑帖鉴藏、著录者，均可存之以广见闻。

本文所用《语石》稿本在扫描复印过程中，得到上海图书馆郭立暄老师的热情帮助，特此申谢！

【作者简介】姚文昌，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。研究方向：目录版本学、石刻文献学。

·书讯·

中国古籍珍本丛刊·孔子博物馆卷 (全二十三册)
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年6月出版 定价：16000.00元

孔子博物馆现藏古籍图书6400余种4万馀册，主要为孔府旧藏，是孔府“诗礼传家”的历史见证，具有鲜明特色。其中的珍贵古籍，已有十三种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这些古籍珍藏体现了孔府藏书的丰富性，是经学与史学研究不可多得资料，具有重要的文献和文物价值。

本书精选其中二十七种善本古籍，按照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排序。其中经部九种，包括《礼仪器制考释》不分卷、《礼服释名》一卷、《春秋三传合纂》十二卷等；史部六种，包括《阙里志》二十四卷、《史大纪》二十六卷等；子部三种，包括《读书札记》一卷、《二程先生粹言》九卷等；集部九种，包括《铁山园诗集》七卷、《晚学集》八卷等。兼有刻本、稿本、钞本，是研究孔府藏书、刻书的重要文献，研究孔府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活动的重要依据，也是孔子博物馆在古籍保护与利用上的又一项重要成果。